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瓷国之光: 上虞古代瓷业回眸/彭尚德主编.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340-2422-1

I. 瓷… II. 彭… III. 陶瓷工业—手工业史—上虞市—古代 IV. TQ17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1100号

《瓷国之光》编辑委员会

顾问: 毛昭晰 鲍贤伦
总策划: 李刚
主任: 蒲伟明
副主任: 张立功 陈桂花
委员: 彭尚德 马志坚 於百明 曹国路
陈鹏飞 章金焕 杜伟 王玲
主编: 彭尚德
编撰: 章金焕 杜伟 王玲
图片说明: 陈晓敏 楼海燕 王佳琪 金辉

发行人: 奚天鹰
责任编辑: 杨海平
助理编辑: 刘晓丹
装帧设计: 龚旭萍
图片摄影: 钱豫强
书名翻译: 郭成钢
责任印制: 陈柏荣

瓷国之光——上虞古代瓷业回眸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http://mss.zjcb.com>)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版 杭州东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0
印数 0,001-2,000
书号 ISBN 978-7-5340-2422-1
定价 1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上虞博物馆

瓷国之光

上虞古代瓷业回眸

LIGHT OF CHINA
A RETROSPECTION OF
THE ANCIENT PORCELAIN
INDUSTRY IN SHANGYU

ISBN 978-7-5340-2422-1



9 787534 024221 >

定价：180元

上 虞 博 物 馆

瓷 国 之 光

上虞古代瓷业回眸

LIGHT OF CHINA

A RETROSPECTION OF
THE ANCIENT PORCELAIN
INDUSTRY IN SHANGYU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瓷国之光

上虞古代瓷业回眸



曹娥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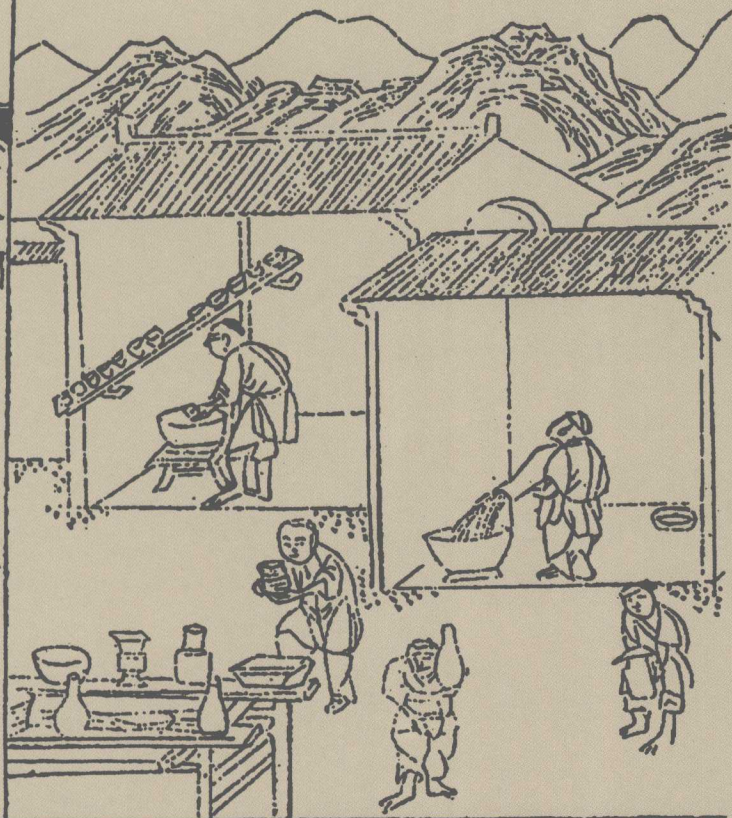
目 录

10	序
12	导 言
14	回眸千年
24	文化纵横
34	泽及四方
40	窑址览胜
57	藏品赏粹
156	参考文献
157	后 记





蕩渤



蕪



序

上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梁湖的后旺遗址、百官的三棚桥遗址、沥海的后郭渎遗址等都为我们的祖先在此生活劳作留下深刻的印记。相传“三皇五帝”时期的舜就与上虞有很密切的关系，史书记载“舜避丹朱于此，因相虞乐，故曰上虞”。春秋战国时，上虞属越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次年即置上虞县，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

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许多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上虞现有石器、玉器、陶瓷器、金属器、书画等各类馆藏文物2万余件；小仙坛窑址、曹娥庙和永元秀塔等国家、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单位58处；历史文化遗产蕴量居浙江省前列。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青瓷文化”、“梁祝文化”、“孝文化”、“东山文化”等品牌文化魅力凸显，成为展示上虞、了解上虞的一张张靓丽名片。

上虞是越瓷的故乡，青瓷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这里便有发达的原始瓷生产，普查发现境内有商至宋历代古窑址400余处，系统地构成了一部越窑烧造编年史。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小仙坛等一批东汉瓷窑址的发现，为成熟瓷器诞生的时间、主体区位和主流源头找到了归宿。东汉上虞成熟瓷器的发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是上虞先民对人类物质文明所作的杰出贡献。

现代考古意义上的越窑调查和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由陈万里先生开始了对浙江古窑址的零星调查，并撰写了《瓷器与浙江》、《越器图录》、《中国青瓷史略》等专著。与此几乎同时的还有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他在对浙江的古窑进行了考察后，于1943年出版了《支那青瓷史稿》。这时人们所谓的越窑是指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的唐宋窑场。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80年代中期，以大规模文物普查为标志。这一阶段上虞先后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境内古窑址遗存数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我市文物工作者，对上浦帐子山窑址、鞍山龙窑、曹娥严村李家山商代龙窑等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国内不少文博界老前辈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先后发表了一些越窑遗址调查和发掘清理报告，特别是《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窑寺前窑址》、《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等文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省内外不少器身带有“上虞”、“始宁”（今上虞南部）铭文的三国西晋越窑优质青瓷器的出土，有力地印证了上虞瓷器烧造的辉煌历史，从而奠定了上虞作为瓷器主要发源地和早期越窑中心产地的历史地位。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以大规模考古发掘为基础，许多越窑研究的论

文、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涌现，使越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我市文物工作者在这一时期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在曹娥庙布置了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上虞越瓷”陈列，全国各地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纷纷前来参观，使上虞越瓷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重要的影响。1988年出版了《越瓷论集》，1990年又出版了《古瓷新探》。此外，还有不少专业论文见诸于省、国家级专业刊物。2000年在新建的博物馆布置了“上虞越瓷”专题陈列，对区域性历史文化遗产专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省内县域文博行业中颇为罕见。2004年、2006年我市又会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园坪、尼姑婆山两处汉晋窑址进行了发掘，取得不少新成果。

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已融为一体。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经济活动，使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和动力。人文精神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观。文化与经济越融合，文化生产力的潜能就越巨大，这也是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根本的、最难替代的、最难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因此，弘扬上虞越窑青瓷文化，促进上虞经济社会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上虞市委、市政府高屋建瓴，立足上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精心谋划上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在这股强劲东风的感召下，文化（文物）工作者当仁不让，积极响应，《瓷国之光——上虞古代瓷业回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工作献给虞舜大地的一份时代菲礼，这是上虞文化建设中的又一件喜事。它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深入梳理、研究上虞越窑，弘扬青瓷文化，传承历史文脉，推动文化强市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虞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是厚重的，又是生动的。上虞，这座铸就历史的城市，留有青瓷之源的印记。上虞越窑青瓷文化恰似曹娥江水，奔腾不息，千古长流。今天的上虞，每一位文化（文物）工作者将进一步把握契机，恪尽职守，奋勇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打造上虞历史之城、文化之城的责任。

蒲伟明

2007年8月

导 言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之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不计其数、难以估量的贡献,世界各国也正是在这些文明的传输过程中了解和认识中国的。

不过,海外各国民族最早熟悉中国,并不是从妇孺皆知的“四大发明”开始的,而是从为时更早的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的丝绸肇端的。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最早的雅称应为“丝绸之国”。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雅称则戏剧性地演变为“瓷器之国”了。近一个世纪来,长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考古学家,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怀着对“瓷器之国”的崇敬之情,沿着古代中西交往的路线,去寻觅中国古代瓷器的踪影。结果,人们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及碎片。由此可见,千百年来,中国瓷器已经深入到了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宗教、建筑、生产以及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面对着这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任何一个文明之人都不會认为揭示中国古瓷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一种闲情逸致或是毫无意义的。在时间的车轮将寰球载入21世纪之后,那些伫立在现代文明灼热土地上渴求沐浴古典艺术甘霖的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那幅“瓷器之国”的历史画卷,而是企



望顺着中国瓷器文化的长河去追本穷源，进而在瓷器的发祥地一览中国古瓷的更迷人的风韵。

人们在追溯瓷器的源头时惊异地发现，瓷器的产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在人类历史上足足横亘了一万多个年头。当新石器时代的帷幕将要落下的时候，中国东南地区的印纹陶迅速兴起，广泛流行。不久，器表施釉的原始瓷便从形容猥琐的印纹陶脱胎而出。虽然原始瓷的产地广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因种种缘故，各地的原始瓷皆未孕育出成熟瓷器，惟独浙江上虞的地理和人文催开了成熟瓷器的绚烂花朵。

研究表明，浙江上虞小仙坛等地的东汉窑场生产的青瓷，烧成温度、抗弯强度、吸水率等已达到甚至超过现代瓷器的各项标准，上虞因此成为举世公认的瓷器发祥地和早期优秀制瓷工艺辐射性传播的中心，对越窑的形成乃至“瓷器之国”的出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东汉至北宋的近千年间，上虞制瓷业的历史从未间断，先后出现了三国西晋的繁荣期和五代北宋的鼎盛期。上虞历代窑匠以卓尔不群的智慧所烧造的无数精美绝伦的瓷器，宛如清澈、潺湲的小溪，蜿蜒流经峥嵘岁月而滋润了海内外的文明社会。



回眸千年

三国西晋——上虞越窑史上的繁荣期



战国·原始瓷盃

当原始瓷步履蹒跚地走过二千年的崎岖道路而跨入成熟瓷器的门槛后，面貌便焕然一新了。东汉至中晚期，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大批烧制成熟瓷器的窑场，所烧的青瓷，胎骨坚硬，釉面平整光滑，不少器物在还原焰中烧成，釉呈现出清纯的青色或青绿色，并具有玻璃般的透明度，酷似一泓春水。东汉上虞制瓷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为越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黄、淮流域遭到了战乱的严重破坏，成为一个烟火断绝、地旷人稀的荒凉地带。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孙策跨过浙江，驱逐了会稽太守王朗，自领会稽太守，吴会皆在孙策控制之下。建安五年（200年），孙权领会稽太守。黄初三年（222年），孙权与曹魏绝，定年号为黄武。自此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鼎立后，孙吴政权为了自立，在自己的疆域内力求社会安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孙权以顾雍为丞，“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

汉末，由于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孙吴政权又力促土著的“山越”人出山定居，使得孙吴的劳动力大增，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带海傍湖的会稽一带，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

汉代，民间厚葬风盛行，“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到三国西晋，厚葬之风仍然盛行。建邺（今南京）是孙吴都城，也是经济贸易的中心。商人聚集在这里，运来各地所出的货物，一片繁华景象。会稽一带所出的青瓷，大量销往这里。

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加，农业的发展，加上很大的市场需求，这些因素促使当时越窑主产区上虞的瓷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上虞越窑步入了制瓷史上的繁荣期。

进入三国西晋，上虞的瓷业生产空前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窑场分布范围广，数量多，规模大

东汉时，窑场主要分布在梁湖、上浦等地。进入三国西晋，梁湖、上浦仍为窑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此外，今驿亭镇的许多地方也开始烧制瓷器，在驿亭镇的杨

溪村、赵埠村、王家埠村、虎岙村、横塘村、冯家村、黄倪岸村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窑址。曹娥、百官也有窑场生产青瓷了。上浦镇的大善、夏家埠村，梁湖镇的罗岭、倪刘村，驿亭镇的横塘、杨溪村，是这一时期窑场分布较集中的地方。

上浦镇夏家埠村的鞍山、胡家埭村的石门槛、曹娥朱山头村的猪头山、百官的九浸岙大岙底、驿亭镇赵埠村的庙湾山等窑场生产的产品具有鲜明的三国时期特征。1977年12月，浙江省博物馆对鞍山三国龙窑进行了发掘。龙窑全长13.32米、宽2.1—2.4米，由火膛、窑室和窑尾三部分组成。火膛为半圆形，长80厘米左右，火膛与窑床之间有一堵垂直的黏土墙，厚11厘米，朝火膛的一面有薄薄的一层“窑汗”。窑床长10.29米，前段较宽，后段渐渐缩小，倾斜度前段为13度，后段为23度。底面铺砂层，两边窑墙用黏土筑成，残高30—37厘米。在窑床和窑尾之间有一堵矮墙，残高10厘米，筑此墙的目的是使火焰流速减缓，墙后有一排前后略有参差的五个黏土柱，高15厘米，黏土柱间有六个排烟孔。窑室中残留许多窑具和器物。

上浦镇大善村的凤凰山、尼姑婆山，梁湖镇华光村的晾网山（其烧造年代下限至东晋），倪刘村的保驾山，上浦镇董家山村的罗夹岙，夏家埠村的新坟山（属帐子山窑群）是三国西晋时烧造规模较大的窑场。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尼姑婆山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龙窑一座。出土了青瓷象形器、兔形水丞、樽、洗、碗、罐、埤、甗、砚等器物。罐的造型多种多样，有些在肩腹部饰牛头、马头、虎头、羊头、鹿头作嘴。还出土了大量硕大的器盖，直径大多在40厘米以上。所见纹饰有水波纹、网格纹、联珠纹、铺首、佛像、柿蒂纹等，纹饰十分清晰。尼姑婆山窑址，代表了当时越窑最高的工艺水平。

梁湖镇罗岭村的朱家山、老鼠山、多柱山，驿亭镇冯家村的石王山，杨溪村的馒头山是西晋时期烧造规模较大的窑场。老鼠山、多柱山的烧造年代下限可至东晋。西晋时驿亭镇横塘村的蛤蟆山窑场还兼烧黑瓷。

1982年至1985年，上虞县文管会对全县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大范围的普查，据统计，全县的窑址总数为350余处，其中东汉窑址为37处，三国至西晋窑址为130处。由此可见，三国西晋时期上虞的窑业规模十分庞大。



东汉·青瓷甗



西晋·青瓷唾壶

2. 产品种类繁多，纹样丰富

三国西晋时，上虞各地窑场除继续烧制碗、罐、盘、碟、洗、罍、虎子、簋、壶、耳杯、勺、水丞、唾壶等日用器外，还新出现了鸡首壶、狮形器、羊形器、槲、埤等品种，东汉时常见的钟、甗、甗等产品在这时少见了。东汉时仅烧造灶、水井、釜斗、窄堵波、堆塑罐等种类有限的明器，进入三国西晋，明器种类大大增加，大量烧制明器是三国西晋时上虞越窑的一大特色。猪圈、狗圈、羊圈、鸡舍、米筛、畚箕、砮等反映现实生产、生活的明器被大量烧制。堆塑罐的罐身堆塑渐趋繁复，中罐不断加大，周围的四罐逐渐缩小并被楼台、殿宇、飞鸟所掩蔽。大量的动物造型的出现是三国西晋上虞越窑的另一大特色。除了狮形器、羊形器、神兽尊等把动物造型做成整器外，不少动物作为局部装饰出现在器物上，如兔形水丞或砚滴、鸽形甗、熊形灯、熊足樽、熊足砚、虎子等的局部都用动物作装饰。堆塑罐上的动物装饰更是丰富。猪、狗、牛、鸡等瓷塑动物还随明器葬入墓中陪伴亡灵。东关出土的一件兔形砚滴，整体做成一只蹲伏的兔子，在兔的背部安管状进水口，腹部呈圆形，兔头前伸，前足捧钵作饮水姿势，后腿弯曲紧贴腹壁，造型优美别致，妙趣横生。百官吴墓出土的一件鸽形甗，一端贴饰鸽头、飞翼，另一端贴饰尾部，酷似一只安然翱翔的飞鸽。装饰纹样的丰富，是这一时期上虞越窑的第三大特色。压印的网格纹、戳印的联珠纹与范印的铺首往往成组装饰在器身上，成为这一时期最常见、最富时代特征的装饰纹样。此外，龙纹、凤纹、菱形纹、四神、佛像、仙人骑兽、麒麟也是此时常见的纹饰。

3. 成型与烧成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碗、钵、罐等圆形器都为拉坯成型，胎壁厚薄一致，同时还采用拍片、范印、镂孔、捏塑等多种成型方法，生产埤、槲、甗、狮形器、羊形器等式样特殊的器物。其中埤基本上用拍片成型法，即先拍成器物形状所需的方形、长方形或椭圆形薄片，然后粘合成器，再接口、足和耳等；槲也一样，器座和隔档都是先拍成片，再粘合而成。梁湖镇宋家山晋代窑址发现的陶范，证明狮形器、鸡头壶的鸡头都是范制成型。堆塑罐的口部和腹部系分段拉坯粘接而成，底和屋檐则用拍片，各式人物和动物，有的用范印，有的用手捏塑，器身的圆孔用镂雕。在大园坪东汉窑址中，贴饰铺首时在器物内壁往往留有手指捺压印。在三国西晋窑址中，这种手指印痕已看不到了，说明当时修坯更细致了。

东汉时，窑内烧成温度虽然很高，但烧成气氛掌握得不够娴熟，产品的釉色不够稳定，常见有青、青绿、青黄等多种釉色。三国西晋时，窑工们经过长期实